

第 1 輯

主編 毛正棠

俊
彩
星
馳

求
是
學
人
群
芳
譜

浙江大學出版社

俊 彩 星 驰

求是学人群芳谱（第一辑）

主编 毛正棠

责任编辑 徐小军

* * * *

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

浙江萧山第二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* * * *

开本 1/32 850×1168 11.375印张 285千字

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3000

ISBN 7—308—00465—1

G·059 定价：精装9.50元 平装：6.00元

前言

“雄州雾列，俊采星驰。

台隍枕夷夏之交，

宾主尽东南之美。”

如果把王勃所撰的《滕王阁序》中的两句骈文转引来表述求是学府和众多求是学人，其意象，其情趣，我想还是贴切的。

东南俊杰，尽集于此。历时90余载的著名高等学府，正是人才荟萃、群星灿烂。

苏步青教授便是求是学人之中出色的一位。

秋高气爽，金菊吐芳，苏先生自沪来杭小憩。他是实在太爱恋杭州和求是园了。他的秘书王增藩伴其同来。下榻伊始，王增藩即刻给我们送来他撰写的一篇文章。50张稿子，实令人叹为观止。这是我们事先电话组稿，恳请他写一篇记述苏老生平事迹的文章。没想到会那么准时，会那么长。我是带着几分疑虑开卷拜读的。然而，洋洋2万余字，竟一口气读完。我不能不为之动容。在湮湮的破庙里，地瓜干蘸盐巴那种岁月，却培养出那么多求是学子，我为之激动；人称“东方第一几何学家”，我为之兴奋。不愧是苏老身边人写的文章，有血有肉，有情有理。苏老的才华、品格，苏老的成就、遭遇，苏老内心深层的情感都写出来了。这就是求是学人的风貌，文章长一点又何妨！我深信读者阅读此文，也会与我有同感，不至于说我夸大其词。

本书开卷首篇，是求是书院创办人林启兴学记实。它的作者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、林启的孙女林艺。浙大90周年校庆时，

她曾特邀来杭。在此期间，她搜集了许多素材，正想写作有关林启的影视剧本。时隔2年，当我约请她写一篇报告文学时，她当然是义不容辞。可是，年迈多病，力不从心，她一连病倒数月。截稿日期临近，她心急如焚。一旦康复，便强打精神，完稿寄来。毕竟是电影编剧，笔下形象丰满。有细节，有对话，有场景，有内心独白。林启，这第一位求是学人的品格、风貌便真真切切、实实在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本书搜集30余篇文章，许多作者是职业的新闻工作者。有新华社、浙江日报、文汇报的记者，有长期从事宣传报导工作的校报编辑、记者。他们写的报告文学、特写、通讯都有一定深度。还有历史学家写的人物传记，则史料真实，文字严谨。

当我们把一篇篇文章从报刊、杂志、书籍中剪辑起来的时候，一种强烈的印象油然而生。求是学人的面貌何其相似。虽然他们的年龄、经历、学识、专业、成就都不尽相同，但都有着一种共同的秉性，一种共有的精神，那就是求是精神。

这使我想起一位美籍华人学者说过的话。他说，在海外有人提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：“浙江大学校友们似乎有一种宗教味道，象和尚‘挂禅’一样，只要头上有几个洞，走遍天下会有人招呼，这奥妙在什么地方？”本书搜集的求是学人的事迹，恐怕能回答这个问题。

一位老学长写信给我，他说编辑求是学人群芳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，我想也是。可是现在仅仅迈开第一步。由于种种条件的制约，许多求是学人的事迹，未能整理出来，介绍出来。本书就算第一辑，作为抛砖引玉，希望将来会有第二辑、第三辑问世。

本书在编辑过程中，得到了各地浙大校友会的关心和支持。自从发出编辑本书的征稿启事，上海、北京等地的校友会都做了许多具体的组稿工作。是凝聚了许许多多人的心血，才有本书的诞生。在此，谨向关心和支持编辑本书的老学长致以衷心的

谢忱。

我还是用《滕王阁序》的最后二句骈文作为结语：

“一言均赋，四韵俱成。

请洒潘江，各倾陆海云尔。”

1989年秋于求是园

目 录

	前言	
1	林启兴学	林 艺
13	铁肩妙手	
	新闻先驱邵飘萍烈士传略	国 栋
39	海纳江河	
	竺可桢治学	正 棠
63	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	王增藩
95	王淦昌——杰出的核物理学家	陈勤华
100	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轨道计算者——束星北	一 乐 穷
114	梅光迪教授	宋 晔
128	我国化学史和分析化学研究的开拓者——王琯教授	
	杨国梁	正 棠
143	智者的早逝	
	——怀念张荫麟教授	张效乾
146	一个开拓者的生活道路	
	——记钱钟韩教授	闵 卓
156	长青树	
	——浙大前校长、著名林学家陈嵘二三事	聂征夫
168	实致名归——汤永谦获奖	曹竹轩
170	冰川学家的心是炽热的	正 棠
177	数学家秦元勋教授	李世海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81 | 溶入夜幕的流星
——记翻译家周邦立 | 胡国华 | 庄建民 |
| 200 | 一位知识分子的路
——记机械工程专家吴恕三 | | 黄艾禾
陈淑华 |
| 207 | 女教师江芷壮丽的一生 | | 张德宝 |
| 211 | 生命之光
——记陈安乐 | 林之平 | 徐有智 |
| 214 | 为核事业顽强拚搏的人 | | 马 兰 |
| 218 | 为国家做贡献是我的本份
——记科工委某研究室主任林俊德 | | 正 棠 |
| 222 | 陈顺理与塔里木长绒棉 | | |
| 231 | 吾土吾心
——路雨祥博士和他的研究室 | 周荣新 | 徐有智 |
| 253 | 毋忘草
——记吕勇哉教授 | | 聂征夫 |
| 266 | 悠悠故国情
——记浙江大学一批归国留学人员 | 周祖佑 | 徐有智
聂征夫
徐有智 |
| 277 | 先飞鸟 | | |
| 294 | 燃烧的青春 | | |
| 309 | 祖国，我是您忠实的儿子
——记浙江省最年轻的教授益小苏 | | 周 丹
蔡显敬
茅铭晨
殷 可 |
| 314 | 寻找自己的世界坐标 | 余肖枫 | |
| 319 | 求是之子 | | |
| 342 | 不懈的追求 | | |
| 347 | 这是一片奋争的天地
——记浙大混合班的学员们 | | 张颖琪 |

林 启 兴 学

林 艺

在闽、杭、衢的府志、县志里，林启被列入《循吏传》或《名宦传》，赞扬他的勤政爱民、刚直不阿。杭州人士则特别赞颂他在兴学育才方面的业绩，称之为“树谷一年，树木十年，树人百年，两浙无两”。本文要记述的正是这位杭州太守的兴学事迹。

创办求是书院

杭州是浙江省的政治文化中心，唐宋以来就是人才荟萃，书院林立。1896年，林启出任杭州太守时，尚有紫阳、东城讲舍、洁经精舍、学海堂等6所书院。但所学的内容却停留在学八股、讲词赋。林启感到这种用空谈义理，溺志词章培养出来的学生，无能作振兴中华的人才，他就请示巡抚廖寿丰，建议在杭州办一所新学。廖寿丰同意林启的意见。但是，他对于杭州一些保守的官绅有所顾虑，怕他们群起阻挠，要林启先去和他们商议。果然，林启一提出办学堂，这些人就大哗，反对说：“我堂堂古国，自有经史诗赋，何用去学那些夷人的邪端异说？”有人说：“我们小小杭府，已有六所书院，还不足用？为什么还要办新学堂？”更有不满的：“府台要办新学堂，岂不误了我等儿孙的前程？”纷纷

吵嚷起来。其实林启对于这些保守派的顽固思想，早已在京都领教过了。但他还是耐心说服：“此言也是。只是当前国势日危，如不图强，恐怕有亡国灭族之危矣。”话刚出口，立刻遭到一位顽绅的攻击：“这是危言耸听啊！”

林启这时不能不严肃起来。“非我危言耸听，怕是诸君不问国事吧！自从甲午战败，我国忍辱缔结马关条约，泰西诸国以野蛮待我，以蔑视侮我。以前他们恨我以大国傲慢自居，如今则侮蔑我中华是愚昧顽蠢。当今朝野上下皆已幡然大悟，思奋起雪耻，振兴图强。然而我等用什么来图强？目前我们是有士不能用，有兵不能战。有船不能驶，有土地却任人分割，有银行却不够赔款。我们虽有国名，实则国将亡矣。你我都是炎黄子孙，岂能坐以待毙，任人宰割？”

林启这一番出自肺腑的慷慨陈词，令很多乡绅为之动容。那几个顽固派也无语可对了。当然他们并不就此罢休。那位顽绅为人刁滑，立即转口说：“府台，只是要办这样一个新学堂，没有白银十万，怕是不成吧？不知府台如何筹措？”

他这一挑动，其他人又应声附合了。“是啊！府台大人素来体察民情，想不致为办一学堂，大兴土木，使地方上劳民伤财吧！”

林启没想到这些人居然企图用经费来阻挠他。可见这些保守派思想之顽固，手段之狠了。当然林启是不会屈服的，其实林启本身就是一个务实的人。作为一府之首，他也是要考虑库银之节省。他早已想到利用已查封的普济寺的房屋改建学堂。这样经费就可以节省三分之二了。但是他为了使这些保守派不能找到任何藉口，他又找了他的助手高啸桐仔细研究。经过几个通宵达旦，甚至连存典生息项下的息银都放了进去，终于预算了一分常年经费，合计不到一万两的开支。这就排除了那些豪绅的有意刁难。因此，当林启为廖巡抚起草的《浙江巡抚廖寿丰奏设求是书院折》一出来，使得那些顽固派相对瞠目，并且也不能不佩服这位知府的精

明笃实。再加上当时的潮流所趋，又有杭府其他有志之士的支持和廖巡抚出面，也就只好偃旗息鼓。表面上不再反对了。就这样，林启终于在杭州创办了一所崭新的高等学堂，取名求是书院。

林启之所以用书院而不用学堂的名称，这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杭州保守派的再干扰，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刺激那些京都保守大臣的神经，而不予批准。这正是林启对保守派势力的斗争策略。后来他办的两个学堂——蚕学馆和养正书塾，则更具有保护色了。

林启所重的是“求是”二字，也就是务求实学，存是去非。林启的思想是维新的，行动是扎实的。他很重视西学，但不是盲目崇拜。他从小生长在五口通商的福州，亲眼目睹那些洋人野蛮地践踏自己的国土，肆意搜刮中华的财富。他为了振兴中华，曾发奋图强攻读中西文。后来在京当御史时，他又考上乙丑科翻译监试，得以博览西欧各国的书籍，对西欧各国的政治、科学作了不少的研究。他的结论是“泰西各学门经甚多，以兵、农、工、商、化验、制造切于时用。语言文学乃入学之门，算数则其阶梯。非博通格致不得为之学成”。可见他对西欧科学技术的重视。但他的前提是“讲求实学，要必先正其志趣，以精其术业”。他办学堂的目的很明确，是为振兴中华培育新才，如果没有这个前提，岂不是为洋人培养买办之才。所以，他一方面聘请美籍人王令赓当总教习，凡是西学课程都由外籍教习讲授。另一方面他又特别聘请了维新派的宋恕先生担任汉文总教习。林启这种把政学和艺学并重的教育方针，比起梁启超政学为主、艺学为辅的方针，似乎是更适合当时国情。林启的教学方法，学汉文却采取了西方的优点，用诱导启发，而不用灌输式死背硬记。国文不是直讲而是让学生自行研读。疑则发问，教师作解释。有时一堂课下来，教师却没讲一句话。特别是在休息或假日，不定作业，由学生自由浏览经史古文和中西各种报纸，将心得之处作札记或日记，定期交老师批改，或与同学相互交流。因而，在求是书院里，常闻有热烈的辩论声。

象这种开放形的大胆革新，是对封建教育的一种有力冲击，当然会引起那些保守派的种种非议。但林启却以学生们的优异成绩，堵住了这些人的嘴。另外，林启的务实精神还表现在他对出国留学的问题上。当时国内派人留学西洋之风很流行，而林启却有独到的见解。他认为赴东洋留学更好，因日本国情与中国相近，日本维新变法后不到20年，已一跃而为强国。又是我们的近邻，费用可省。派西洋留学1人之费，可供10人去日本之用。因此第二年初，他就派4名高才生留学，分学冶金、兵工、法律、商业。以上一切都可以充分的说明林启的政治观点和立场是维新派，他曾问过一位最亲近的学生：“你是‘帝党’吗？”学生不敢正面回答，只说：“群而不党。”林启却坦率地说：“我是的。”当然这也是林启本人所受的历史局限性，但从历史的唯物观点看，当时的“帝党”还是代表了某种先进思想的。林启虽然没有名列新党内，但却是一位脚踏实地把维新思想付诸实施的改革者，这也正是国家和人民需要的。

求是书院办到第二年(1898年)更是健康地蓬勃发展着。学生纷纷涌来，又不得不取消了原来对学生出身(举、贡生)的限制，增加了外院生。接收了那些具有救国热忱而有才智的学生。

这年四月，戊戌变法的消息传来，林启欣喜之至，情不自禁地邀高啸桐到他书房畅饮一杯，遥祝维新变法的胜利。高啸桐更是兴奋地说：“皇上发愤，康梁柄政，国家有望矣。”他又指着光绪下定的国是诏书给林启看：“林公，其中有关文教、经济改革的条例，如果早下来五年，你在衢、杭进行改革措施时，恐怕也不会这么艰难了。”林启却感叹地说：“那也是天高皇帝(指慈禧)远，我才能得以按自己的意志为一个地方的百姓作点实事啊！”说到这里，林启突然放下酒杯沉思起来。高啸桐一楞，望着林启：“林公，你想到了什么？”林启低声自语地说：“这次她，(指西太后)为什么没有些许动静？……”一句话提醒了高啸桐：“是啊，莫

非那拉氏(慈禧)会……”林启摇头：“宫廷之内高深莫测啊！”因他的二子志恂在旁侍奉，他就不再说下去了。志恂是不宜在旁插话的。只是在心里认为：“父亲未免有些杞人忧天吧。”

一直到戊戌政变后，他才对父亲的远见卓识有了更深一层的敬佩。这里再提一下高啸桐，杭州人也知道他是一位思想维新、行动干练的人。由于为人耿直不被上司所用，而林启对他却一见如故，聘他为师爷，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。他在执行教育改革中，高啸桐提出了很多大胆创新的建议，林启都一一采纳。高啸桐小林启19岁，应是林启的晚辈，但林启却不以长者自居。凡是自己有什么政见，从不讳避高啸桐，高啸桐也能为他分担忧喜。二人亲如手足，合作无间，如鱼得水。

康梁柄权后，京都也开办了京师学堂，並下令催促各地速办学堂。一时之间，全国兴起了一片办学堂的热潮。浙省廖巡抚也异常兴奋，命求是书院作为筹设学堂总汇之所。这样一来，求是必须增设校舍，又要收买土地。由于经费困难，林启大有接应不暇之苦。但为了支持新学，只得先借款千两作为建筑设备之用。谁知学堂才破土动工，戊戌政变发生，慈禧重新训政，光绪被软禁，谭嗣同等6人被杀，康有为逃亡日本。百日维新，只是昙花一现。

林启虽然对慈禧有所警惕，但慈禧的行动来得迅雷不及掩耳，又是心狠手辣，却是林启所没料到的。尤其是谭嗣同等六君子的壮烈牺牲，他非常沉痛而愤怒，但他只能和高啸桐默默相对。二人忧国之心久久不能平静。这时在京城的一些维新派，人人自危，甚至连那些和新党稍有接触的大小官员，也都纷纷离京而逃。这人心慌慌的气氛，也象瘟疫般地传到了杭州。有好友劝林启暂时回闽躲避，林启一笑：“我又不是新党，何所惧也，况我是杭府一父母官，焉能擅离职守？”说完又忙着去处理求是书院(因又奉命收缩)欠下的那笔千两的债务了。但是杭州的那些顽固派，则又蠢蠢欲动。首先叫自己或亲属的子弟向求是书院提出退

学。这一来引起另一些胆小的家庭和学生，也跟着纷纷退学，弄得书院一片凄凉。留下的学生只有十分之二了。教职员们也有些紧张。学监请示林启，林启却巍然不动地说：“留下的人虽少，却是我校的佼佼者。一粒良种，就会开出鲜花，结出硕果。何况还留下二成呢。时局再艰难，只要有一个学生也要办下去。不要为一时的挫折吓住。我以为，只要有了求是的精神，书院是会长期存在并发展的。”教职员的情绪立刻稳定下来，继续上课，每逢“望课”（十五这一天），林启仍到院讲课，学生们深受鼓舞，更发奋攻读了。而林启却由此得到启示，以后求是书院的学生来源，举人贡生等将不再适宜，必须再办一座中等学堂，才能源源输送。

蚕学馆，为现代蚕丝业奠基

在创办求是之后，林启创办蚕学馆。

杭州是浙江省经济中心，主要来源是蚕丝。谁知那十几年一落千丈。尤其是马关条约和中日通商条约签字后，日丝大量充斥市场。每年要少银580万两，国家关税每年减少50万两，林启大为震动。“如此下去国家利益外溢，百姓生活更趋贫困。”于是他亲自微服下乡，进行调查研究。

谁知正逢蚕月，家家闭门，门口挂着红布条。林启懂得这是不欢迎客人的蚕禁，他懊悔自己来得不是时候。正在踌躇不前，却见一对老年蚕农夫妇，端着蚕箔把蚕向河沟里倒去。林启忙向前探问：“老人家为什么把好端端的蚕宝宝弃掉呀？”蚕农满脸愁容地叹气说：“这些蚕只吃桑不上山，要它们何用？”林启拣起一只蚕，仔细观察：“这蚕有病，怕是您老饲养不当吧！”蚕农生气地顶撞说：“我祖宗三辈都养蚕，你倒晓得我养法不得当？”蚕农当然不知道站在前面的人，就是这一府的父母官。林启更不在

意，又关切地问：“那是什么缘故呢？”蚕妇却忍不住泪汪汪地说：“唉，还不是命不好！”老农这才说：“先生，实话说吧，这蚕就是上了山，也吐不出好丝来，哪能比得过东洋来的丝，还不是白白费了桑叶？”

这几句话使林启猛然有所悟，连忙又拣起几只蚕，小心地包在自己手帕里，匆忙转身就走。谁知善良的农妇却喊着：“先生，不要带这蚕回去，你是会倒霉的呀！”跟随林启的仆童正要喝住，林启却抢着也高声回答说：“多谢你的好心，我不会倒霉的，明年我给你俩送好蚕种来。”边说边大步流星地赶回去了。

林启把蚕带回后堂，刘夫人高兴地说：“是否又要在府院养蚕？这次儿媳们可自己把蚕室都收拾好了。”原来林启在衢州时为了提倡养蚕，请刘夫人亲自带着儿媳喂蚕。儿媳们经过那两年的实践，对养蚕也有兴趣了，还想一露身手呢。谁知林启却摇摇头抱歉地说：“这里养蚕不用提倡了。”刘夫人倒有些失望，就风趣地说：“啊呀！怎么你这‘天子不躬耕’了！我还等着当‘视蚕皇后’呢。”林启也被她说笑了。“皇后当不了，就当一名教习师母吧！”“怎么你又要办第二个求是书院？”“不，我要办一所科学养蚕的学堂。因为杭府不同于衢州，养蚕之事，不是提倡，而是提高技术、改良蚕种。但蚕农没有文化，不相信是蚕种退化，又没有科学知识，只是求之于迷信。必须从根本上着手，培养一批养蚕人材。”刘夫人立刻认真地问：“那么要我做些什么呢？”林启也风趣地说：“只要你的四个儿子出来帮忙。”刘夫人禁不住开心地笑了起来，“儿子们不是每天都跟着你在书房走动吗？”“只是这回是要他们到外省去作些调查，也可能几天回不来，我怕子媳们不放心啊。”刘夫人连连点头：“好，好，这我一定办到。”林启和刘夫人感情甚笃，林启个人生活上很严谨，从不二色。

刘夫人对林启的为人非常敬佩。林启在事业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，她都尽力支持。尤其是林启因公而捐私蓄时，不管

需要多少，她都尽力筹措，甚至不惜拿出自己陪嫁的首饰。林启夫妇有四子一女，平日他从不允许他们用太守或府衙的名义在社会上活动。只是随任在府，每日早餐后即到书厅，协助父亲作各种研究工作，或攻读中外书籍。因而杭州人对他的子女很少知道。

林启这次为什么要他们出去呢？因为林启接受了办求是书院的经验，他知道要办这个学堂，一定又会有人反对，特别是那些为日商、洋商作买办的豪绅们。他们比起那些保守顽固派更为刁滑。因此，如果要避免和他们当面交锋，就必须用大量的事实来说服他们，使他们无隙可乘。因而当他的四子出外调查回来，搜集到一本十年前宁波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康发达写的一份禀呈，以及一本日本出版的蚕书，林启如获至宝，和子辈们反复研究。又即刻派人邀请由康发达派去法国留学的工头江生金，到他府署来，亲自向江生金详细询问请教。当江生金介绍他在法国巴斯顿学院学习选种的方法，以及参观意大利和日本等地的蚕丝情况时，林启就象学生似的专注倾听着，并让二子作记录。江生金虽然没有学历，但林启认为他对蚕业有专业知识，就破例聘请他担任养蚕学堂的总教习。这在当时也可说是一个大胆的突破吧！同时，他又自己筹款，向国外买了小号显微镜三种，领着二子在府内作选种试验。终于在掌握了大量的中外资料，和亲身的实践后，这才向上级写禀呈，请筹款创办养蚕学堂。

林启作事一贯严肃认真。每当他批阅公文或写禀呈时，从不用司书代写，都是亲自动笔。他经常在自己书房里写到深夜，而不顾自己的劳累。但他对于下级或仆从，则体贴入微。总是让厮僮先去睡眠。也从不让四子陪侍，独自一人徘徊在蕉竹之下，反复思考成熟后，才伏案疾书。当时的情景，正如林琴南先生在《林启迪臣先生寿序》一文中所描述的一样：“……余间日辄造先生。官书盈尺，隆而手治之。左右无僮厮执役之人，窗外蕉竹肃

然。”有时刘夫人让小女植英给他送外披。小女缠着要他休息，他就是在最紧张的时刻，也立刻放下纸笔，慈爱地向小女解释他办公文的重要。然后送小女回到内堂，自己再返回，继续写到黎明。后来植英曾回忆说：“我父勤谨劳瘁，非常人能胜任的，而父亲却处之泰然，未尝有倦容。”只是她还不理解，林启如此操劳的动力是什么。林启在给浙省抚署的《杭州知府林迪臣请筹款创办养蚕学堂稟》中写道：“就时局而言，为中国之权利；就王政而言，为百姓之生计；就新政而言，为本源之本源；就浙省而言，为切要之切要。”这就是林启那爱国爱民，一片赤子之心的动力。同时，林启正是一位精明笃实的人。那稟呈中，既有高瞻远瞩的理论，又有细致的科学分析。既要求拨款，又考虑库银的节省。他为一府的太守，作事就要有事半功倍的求实精神。拿今天的话来说，这是一份既有宏观又有微观的很有说服力的好报告。因而他的稟呈即刻得到巡抚廖寿丰的批准，就连蚕桑局的人也很支持，至于那些买办洋奴也就无可奈何了。

1897年，林启终于在杭州的金沙港创立起一座中国人自办的农业学校，取名蚕学馆。蚕学馆，这是多么陈旧的名字啊，似乎和林启的维新思想格格不入吧！不，这正是林启的用心之苦。他说：“名字，只是物的表形。他们既重名，我则可以求实矣！”

果然，蚕学馆的内容是崭新的，课程是西欧的。如理化、动植物、蚕体生理、病理、气候、土壤、饲育、缫丝，还有显微镜。更值得一述的是，林启在教学方针上的一系列措施：第一，引进来，放出去——为了能将日本的养蚕科学技术引进来，他亲自请日本领事馆介绍，重金聘请了日本的养蚕专家轰木长先生任总教习，前岛次郎及西德工太郎任教习。同时又先后两次派优秀学生去日本留学，专攻养蚕和蚕丝制造。第二，理论和实践的结合——凡学生所学的课目，都要进行实习。尤其是第一年的蚕月期，作为校长的林启，每晚公事完毕，就放舟去蚕学馆，和同学们一起视

蚕，通宵不懈。直到蚕上山作茧。当第一批蚕种出来后，经袁木专家鉴定，认为是纯系优良的新品种。师生们欣喜若狂，奔走相告。林启也是心情激动。但是，他却不是那些为育种而育种的学院派，他想到的是蚕农需要它。他即刻采用以点带面的方法，派学生带着蚕种，到各乡镇去指导试养，并以此作为学生的考试成绩，还特别嘱咐给那一对蚕农老夫妇送去。果然当年的秋蚕，就产生了经济效益。于是四乡农民纷纷来蚕学馆购买蚕纸，并请教新的养蚕方法。第三，提高与普及的结合——林启考虑到偏僻的乡镇，根本没有条件购买显微镜。他就请学生用通俗的文字翻译《微粒子病肉眼检验法》以及西欧的养蚕新法等书，直接分发下去。又让写稿给上海出版的《农学报》广为指导。同时命各县府订阅《农学报》，请人按期给农民讲读。林启这种把教育和经济密切结合的尝试，引起全国各省的注意，江苏、江西、福建等地都来争购蚕种，并纷纷设立了学校。如广东、湖北、四川、南京等地的蚕桑学堂，师资的来源，大多出之于蚕学馆。如上海的女子蚕桑学堂，就是史量才办的。特别是引起了西欧、日本各国蚕业界的震撼。日本的报纸上登载了关于杭州成立蚕学馆的报导、评论，认为“中国的蚕丝，将要重新崛起”。而那时的维新思潮，虽已兴起，但离戊戌变法还有一年。林启却开创了教育和振兴实业紧密结合的范例。既挽回了浙江省即将枯竭的蚕丝利源，又为全国蚕丝业的发展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现在看来，林启可以说是我国现代蚕丝业的奠基人。

杭州第一所中等学堂——养正书塾

杭州曾是佛教圣地，寺院之多可列全国首位。其中也就必然有鱼目混珠者，借佛教之名，行不法之为。位于大方伯的园通寺和尚，平日依仗官势为非作歹，不守清规。信徒们诉之府署。林启